

数字化改革的突破与期待

兰建平

喜迎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理论特稿

数字化改革作为“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迭代深化,是浙江为推动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生产力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一场自我革命,是当前浙江提升治理能力、激发社会活力、应对风险挑战、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招”。数字化改革突出问题导向,开展顶层设计、迭代总体框架、贯通基层实践,全方位纵深推进,形成了一批具有改革味、共富景、数字范的标志性成果,彰显了浙江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新探索、新实践。

数字化改革实现了三大突破

数字化改革是按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所开展的一场原创性制度变革,是关于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从改革的实践来看,数字化改革至少实现了三大突破:

一是观念上的突破。面对千行百业、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复杂巨系统,如何科学把握各种变量、精准识别各种态势,树立起数字化、系统化的思维,采取数字化、网络化的方法,努力化业务流为数据流,化模糊为精确,化经验为科学,是全方位、全领域推进数字化改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各行业、部门、个体的知识结构、年龄层次有所差异,但是在数字化改革的观念上应是一致的,工作的指导思想应是一样的。推进数字化改革的共识广泛凝聚,数字化观念和思维范式进一步深化,思想内驱力逐步形成,可以说是这场数字化改革最大的突破。

二是体系构架的突破。从促进政务公开、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电子政务工程开始,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与政务能力建设深度融合,开发了各种信息系统和场景应用,极大地推动了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但是,此前的场景应用各自独立,系统建设也千差万别、千姿百态,容易出现重复性建设和同质化问题。因此,数字化改革必须要有科学的顶层设计和体系构架。起初,省委以“152”工作体系为大框架,搭建数字化改革“四梁八柱”,即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群数法治五大综合应用(包含“产业大脑+未来

工厂”“城市大脑+未来社区”等核心业务场景),形成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两套体系。在此基础上,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纵向推进到基层治理领域,横向扩展到数字文化领域,由全面深化改革“1+7+N”、数字化改革“1512”、共同富裕示范区重大改革“1+5+n”集成为“1612”体系构架。可以说,一体化、体系化的顶层设计,解决了信息化进程中一些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省域层面信息化与数字化体系构架的突破。

三是场景应用的突破。自2017年我省明确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以来,数字化更多赋能在经济发展上,主要体现在生产技术上,包括基础技术和使能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通信等先进技术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后,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并开始向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社会治理、关键民生小事等更大范围拓展,颗粒度更细,“小切口、大牵引”成为撬动数字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例如在城市空间治理上,形成了“城市大脑+未来社区”的数字化场景,让城市管理更智慧,让市民生活更美好。

数字化改革需要持之以恒

必须指出的是,数字化改革每一步的深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需求,数字化改革必然是动态的、持续性的。当前,国家层面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这必然要以统一的数据平台为底座;从省域层面看,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试点等,都要求以抓实战、能实用、求实效为导向,大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因此需要聚焦数字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精准施策,全方位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

首先,不能有“息一息”的思想。数字化改革的许多工作都是从“0”到“1”,工作量是实实在在的。有的部门和单位在场景应用上线、系统运行平稳、初步满足要求后,可能会产生放慢一点、休息一下等各种想法,或

是在系统迭代升级中,碰到了一些困难、遇到了一些问题,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畏难心理。在数字化改革

的大潮中,必须树立起“不走在前列也是一种风险”的意识,决不能有“息一息”的侥幸心理。

其次,场景还须进一步从“小”走向“大”。数字化改革在“小切口、大牵引”上下功夫,取得了亮眼的成绩,类似“浙江人卖在线”“安薪在线”等应用,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但是现在一些场景应用从大处、远处看,改革的成效还不够明显。尤其是针对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共性问题,如何发挥数字化跨越时空、展望未来的效用,研究制定清晰标签、精准画像,推出更大的跨场景应用,是深化数字化改革需要进一步破题的方向。

第三,要继续推进数字化改革取得新突破。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面对“整体智治”的更高要求,不能形成对原有系统的路径依赖,技术应用也不能只停留在对原有系统的修修补补,而要敢于进行技术构架的创新突破和系统的迭代升级;另一方面,数字化改革要从“盆景”变成“风景”,必须积极推进“一地创新、全省共享”。要聚焦进一步放大、呈现更多改革的效果,形成长效化的制度,让像“两山银行”这样优秀的数字化改革举措尽快走向全省。

全方位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

在近期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为浙江数字化改革提供根本遵循、指明前行方向、注入强大动力。改革是迈向现代化的发动机,要让数字化改革不断成为推动和促进浙江实现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先行的有力抓手,成为浙江具有时代特征的鲜明标识。在数字化改革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聚焦重大需求、推进重大改革、打造重大应用,进一步完善推进机制、形成成熟模式,用今天的浙江实践为明天的中国探索提供更多的成功经验,这是对数字化改革的最大期待。

期待常态化的重大需求分析和落实机制。突出问题导向,始终是数字化改革的逻辑起点。要把需求分析作为数字化改革的一项常态化工作,形成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运用数字化的理念、思路、方法、手段,以

业务流形成数据流,用好模型与优化算法,去解决问题、改进和优化治理方案。对于中央和省委的改革部署,尚未形成场景应用的,要主动谋划落地应用、编制“三张清单”、加快实施进度;已经有应用支撑的,要结合最新的要求,进行迭代升级和完善。

期待完善数字化改革的争先创优机制。现代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文明新时代。浙江的这场数字化改革,是具有科技感的一场新改革,评价与考核机制也要充满数字味与时代感。要层层压实责任,推动“一把手”成为数字化改革的真正领导者,成为重大应用的谋划者、重大改革的引领者。着力构建体现“三改”融合的重大改革(重大应用)评价体系,既看当前也看长远,把实战实效评价与过程评价有机统一起来;既看数字化改革对工作的实际推动,也看制度与理论的提炼,把硬实力与软实力提升有机统一起来。

期待健全改革的风险防范与化解机制。从外部看,改革、发展和稳定面临“灰犀牛”与“黑天鹅”的影响;从内部看,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明显增多。既要通过改革防范化解风险,又要防范和化解在改革中的风险。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改革风险防范体系,运用数字化的手段,及时发现、预警、跟踪、处置各种风险,化各种不确定性为最大的确定性。进一步完善改革方案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数字化的话语体系,力求精准,不能凭空猜测解读,更不能牵强取义。高度重视数字化改革中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系统安全等,推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公共数据全周期安全监管机制,努力构筑全方位安全保障防线。

我省开启的这场数字化改革,符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数字化改革对于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深化改革的要求看,数字化改革符合国家所需、浙江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下一步,我们要继续聚焦新问题、采取新措施,推动更多彰显浙江辨识度、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应用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以改革突破争先的高分报表,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作者为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解读新思维

200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在联合发布的《蓝碳:健康海洋对碳的固定作用》评估报告中正式提出“蓝碳”概念,指出全球自然生态系统每年通过光合作用捕获的碳中约55%由海洋生物捕获并固定储存于海洋生态系统,该部分的“碳”被称为“蓝碳”,即海洋碳汇。在我国明确提出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蓝碳的重要性受到广泛关注。相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绿碳,蓝碳储存时间长,平均可达到数百年,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能力被认为是我国增加碳汇、实现碳中和最有潜力的生态学途径之一。

傅维琦

蓝碳的价值和应用
要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生态系统碳汇的增加。海洋可通过溶解度泵和生物泵吸收二氧化碳,储碳量则达到陆地的近20倍、大气的50倍,是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最主要的缓冲系统。

近年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我国针对滨海生态系统采取了多项保护措施。例如,在滨海湿地建立了数十个红树林保护区、多个海草床和盐沼湿地保护区。基于蓝碳量化研究方法的的确立与应用,我国对滨海生态系统蓝碳开展了收支监测和模拟实验等研究,并通过恢复盐沼湿地、红树林、海草床等生态系统来获取新增碳汇。新增碳汇可纳入碳积分和碳交易系统,通过市场机制更有力地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海洋生态系统“溶解度碳泵”“微型生物碳泵”等固碳理论不断发展也为我国实现海洋资源低碳可持续开发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撑,有利于打造以蓝碳为核心、海洋生态与资源开发相协调的海洋经济,推动单细胞海藻资源化、海水养殖、环境监测与生态工程开发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此外,海洋蓝碳生态系统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也具有广阔的前景。例如以海洋牧场为载体,研发支撑蓝碳生态系统的关装备技术并实现应用。在这方面,浙江舟山依托环杭州湾产业带规划,着力搭建集蓝色碳汇高新技术工业、科技咨询业和配套服务业等一体化的产业格局,建设具有舟山渔旅文化特色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这是建设海洋强省、海洋强国的一个新方向,同时也是极具前景的蓝碳应用方向。

发展蓝碳的浙江路径

浙江海域面积超过陆地面积的两倍,发展蓝碳对浙江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作用。增强海洋碳汇能力,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建立健全保护和引领蓝碳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大对现存红树林等蓝碳资源的保护力度,提高蓝碳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促进海洋碳汇的发展。制定对重要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激励政策,加大对蓝碳生态系统修复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浙江海岸带生态修复,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蓝碳生态系统的生长面积。如针对浙江沿海营养盐较匮乏的海域,通过人工上升流/下降流等人为干预降低海水分层带来的营养盐分布不均,促进单细胞藻类的均衡生长。对于氮、磷等主要营养盐较丰富的海域,可通过开发新型人工景观灯等照明设施实现目标生态系统光合作用和固碳效率倍增,增强海洋碳汇能力。

二是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既要联合国内外涉海科研力量解析海洋碳汇形成过程的关键调控机制,厘清浙江蓝碳的源汇格局,制定好浙江的蓝碳计划,也要加强蓝碳生态系统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与修订。蓝碳交易相关的政策和规划是构建蓝碳经济新模式和产业链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因此,要加强对海洋碳汇的统计和监测,制定蓝碳价值核算标准,推进海洋碳汇交易市场的形成,促进其生态价值转换为经济价值。

三是开发蓝碳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大力发展蓝碳经济。在低碳经济的大趋势下,发展海洋资源产业不仅可以增强海洋碳汇,还可以修复生态环境、降低灾害风险,促进旅游、生物、医药等相关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海洋核心竞争力。例如以“贝藻养殖”等海水养殖方式替代粗放的传统养殖方式,不仅可以提高海洋碳汇,还有利于优化养殖结构,提高养殖效率和产品竞争力。通过海洋科技创新,开发新一代低碳化学品和高附加值医药类产品,取代石油基产品,推动蓝碳经济快速发展,助力实现“不减产的减排”。

【作者为浙江大学海洋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扫一扫
看长图

观点万花筒

搞好金融是深改主攻方向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目前,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这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说绝非长久之计。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才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需要研究。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率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再比如,目前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中央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这个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双碳”目标,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金融部门不能“谈碳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国内机构能否抓住机遇?

五是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地获得财产性收入。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类似的还有很多,需要系统研究。

(转载自央广网)

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吴敏启

专家观点

全省职业教育大会提出,完善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服务有力、机制健全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人才培养高质高效、发展需求有效满足、社会大众广泛认可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助力乡村振兴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也是浙江发展的现实需求。浙江职业教育基础扎实,目前拥有本科层次职业学校2所、高职高专院校49所、中等职业学校348所,在校生126.56万人,这些院校和学生是浙江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力量。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新《职业教育法》要求,国家采取措施,支持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职业教育可以在乡村振兴的多个领域发挥作用:

一是“产业富农”的经济功能。职业教育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特色办学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村主导产业,发挥激活农村产业活力的“提速器”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整体迭代提升,提高乡村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消薄增收”和“强村富民”,夯实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二是“人才助农”的教育功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充分发挥各类主体在乡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农村既是职业院校重要生源地,也是人才就业与创业的“蓝海”。以职业教育提升农民

群体的发展能力,培养更多年富力强、能够扎根农村、懂现代农业的多元能、专业型人才,践行代农的“扶志”“扶智”“扶业”协同发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又可以为乡村发展和稳定提供强大内生动力。

三是“科创兴农”的技术功能。职业教育的定位导向和乡村振兴所需的技术赋能是相关联的,职业院校可以加大在农业科技创新上的学科建设和产教对接,把产教融合中形成的技术成果和应用性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推广新品种、传授新技术,提供现代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精准营销、品牌推广提升、物流服务优化、客户关系管理等全产业链技术技能服务。

四是“文化强农”的治理功能。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有利于培育具有现代农业特色的新型农业、乡土文化记忆的新型农村、现代文化观念的新型农民,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在提升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和素养的同时,职业教育所提倡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和劳动教育等又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精神世界,引领乡村风尚,推进乡村治理。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运作逻辑

当前,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设具有浙江特色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现代职教体系,通过提质培优,完善自身形态结构,提升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深化产教融合,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聚焦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农民急难愁盼问题,深化职教供给侧改革,主动适应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需求。在学科设置上,

可考虑实施“1+N”融合发展模式,“1”是对接乡村主导专业的若干专业,“N”是与主导产业关联的若干专业,按照“产业群—职业群—专业群”的产业与教育耦合逻辑组建高水平专业群。着力在茶叶、柑橘、蚕桑等精品农产品和浙系特产上做强做优,在电商助农、发展智慧农业和绿色农业上加大探索,在推动乡村旅游和村庄提升、加快发展设施农业上多出成果,在乡村传统技艺传承等方面打造品牌。在培养方式上,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探索形成“学校+企业+乡村”合作育人模式,开发“项目+创新+创业”行动育人载体,延展“校园+庭园+田园”联动育人课堂,培养有知识、善管理、懂经营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

完善制度体系,增强职业教育的普惠性。新《职业教育法》规定,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不同层次职业教育有效贯通,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要加快推进中高职、中本一体化,扩大探索,在推动乡村人才培育规模,打通职教升学“断头路”,完善“人人都能出彩”的教育体系和制度规范。职业院校要通过不同形式的教育模式,打造“浙派工匠”,涵盖农民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等环节,实现教育的普惠性和公益性。特别是要依托专业优势,为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获得高水平技术技能和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为新型职业农民、农村退役军人和新成长劳动力等开展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有效帮助低收入农民群体提升就业、创业的能力,拓展其增收渠道,助力实现“扩中”“提低”目标。

优化办学布局,增强职业教育的协调性。职业教育的协调性,包括内部要素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要因地制宜、结合特色、整合资源要素,促进对乡村急需领域的职业教育供给。对山区26县等职业教育后发地区,要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开展“一县一策”帮扶,加快职教布局。加强农村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培育一批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学校,支持高水平涉农高职院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采取校企合作、政府划拨、资源整合等方式建设一批实习实训基地。通过城乡、院校、校地之间联动发展、协作帮扶,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打破职业教育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全省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协调发展。

结合科技发展,增强职业教育的创新性。职业教育具备丰富坚实的创新基础和潜在的科技创新内在活力。职教科技助农首先要结合农村对新知识、新技术的需求,不断探索分门别类的教学和培训模式,变革“1+X”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培育现代农民。此外,要积极构建职院校科技助农体系,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用专业知识服务农业科技创新。当前特别要聚焦数字变革,把数字化改革贯穿到乡村振兴全过程各领域,以“浙农”系列数字应用为切入口,创新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农村领域的应用,依托“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现“农业+”,形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在科技创新中放大和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成效。

【作者为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